当代后稷扎根黄土地，“不像专家像庄稼”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科学家群像记

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的杨凌，是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《诗经·生民》记载：“诞后稷之穑，有相之道……”相传4000多年前，“农神”后稷教稼于此，开创出光辉灿烂的农耕文化

“远看像卖炭的，近看是农科院的。”在今日“农科城”杨凌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大批农业科学家，头顶专家、学者的光环，却朴实得如同庄稼汉一般。他们远离大都市的繁华，扎根小城或田野乡间，终日与黄土为伴，将科研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，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

刘占德

李华

刘朝斌

单卫星

本报记者李勇、陈晨

多年以后，刘占德依然清晰地记得，他在去往陕西眉县猕猴桃试验站报到的路上接到的那个电话。

彼时，这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教师，刚刚结束在新西兰为期一年的进修，回国不久。

“你在机关干得好好的，现在又是个‘海归’，怎么被‘贬’到试验站去了？是犯错误了，还是谁欺负你了？”电话那头，朋友一连串的问号劈头盖脸。

刘占德心里清楚，没人欺负他，是他自己主动要求下去的。朋友不知道，连去新西兰学习猕猴桃的机会，也是他为下站做准备、毛遂自荐申请来的。

“我学林业出身，还是想干点技术方面的工作、当个‘专家’，坐在办公室里浑身不得劲儿。往地里一扎，我这心就舒坦了。”可挂了电话亲身走进试验站，刘占德才明白朋友的担心因何而来：

“岭脚下一处废弃的院落，仅有一条土路与外界相连，杂草丛生、房屋破败，连周边的村民都嗤之以鼻，那地方，鬼都不去！”

但就是这个地方，刘占德一待就是8年多。在这期间，他和团队推广新技术、新品种，帮助眉县成为陕西猕猴桃的优生区。如今，坐在条件已大为改善的试验站里，回忆往昔，他感慨万千。

在位于“农科城”陕西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（以下称西农大），刘占德这样的农业科学家还有很多。他们头顶专家、学者的光环，却并无书卷气，朴素得如同老农庄稼汉一般。他们远离大都市的繁华，扎根小城或田野乡间，终日与黄土为伴，将科研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，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。

“连麻雀都往外飞”，他们选择坚守

> “科学研究有连续性，挪窝要另起炉灶，走啥！”

1986年，摆在新中国第一位海外葡萄酒专业博士李华面前的，有两种选择：

一是留在法国继续从事葡萄酒专业研究，学术条件优越、自然环境良好。一是回到**当时还是一个小镇的陕西杨凌**（注：当时为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，现为陕西省直管的杨凌示范区，本文统一为“杨凌”），物质条件艰苦，学术从零开始。

李华可以不回来。毕竟当初和他一同乘机赴法的200多名公派留学生，有三分之二都留在了国外。但**他还是毅然回来了，在杨凌一扎就是30多年**。

若干年后，李华的博士生房玉林做出了和导师一样的决定。他婉拒了国内多家知名葡萄酒企业伸出的橄榄枝，放弃了从政与出国的机会，选择留在西农大任教。

“老师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葡萄酒人，放弃了欧洲优越的条件，回到当年非常荒凉的小镇。我能留下来直到今天，也是受老师言传身教的影响。这或许就是一种传承吧！”如今已是西农大葡萄酒学院院长的房玉林说。

此言不虚。**李华回国时的杨凌**，虽然坐拥西北农业大学、西北林学院、陕西省农科院等多家农业科教单位，但**名为“农科城”，实为农科乡**。仅有的一条马路尘土飞扬，城市功能严重不全。

刚来杨凌时，当地人吃的玉米发糕，咬一口直塞牙缝。南方人李华吃不惯，想吃米饭却寻不到。他跑到街上买了碗稀饭想解解馋，用勺子一舀，稀汤里竟几乎没有米粒。

“当初回来时，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希望用葡萄让百姓富起来，咱们中国也能酿出世界顶级的葡萄酒。”李华说。

艰苦的条件下，李华跟随导师贺普超先生，**从“无教师、无场地、无教材”的基础起步，办起新中国第一个葡萄和葡萄酒专业**。没有教材自己动手编，没有老师四处招兵买马。没有实习场地和实验室，李华就跑去酒厂和人家谈合作。

“进了酒厂，人家工人不理我啊！为了和他们打成一片，就得把自己变成他们，喝酒，人也变得豪爽！”就这样，**李华陆续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葡萄酒专业、亚洲第一个葡萄酒学院**，参与制定了第一个葡萄酒国家标准。西农大也成为国内葡萄酒专业教育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
不只是李华，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杨凌人来说，是走是留，都曾是一个困惑。

一组数据道出了彼时的尴尬。仅“八五”期间，杨凌就流失高中级科技人员800多人，农业院所的一些博导、系主任不辞而别。**有些分配来的大学生一到杨凌，不等报到便一走了之**。农科城几乎到了生死存亡之际。

“不光是孔雀东南飞，连麻雀都往外飞！”杨凌一位老干部回忆说。

但王辉也没有走。这位日后的陕西省小麦育种首席专家，依旧和往常一样，一到夏天就铺一张凉席睡在晾晒场，守护一年耕作的麦子。不是没有调去沿海高校的机会，可但凡有人提这事，他便两眼一瞪：“科学研究有连续性，挪窝要另起炉灶，走啥！”

保留的火种，终成燎原之势

> “全国葡萄酒行业80%的技术骨干出自西农大。国内11家葡萄酒上市公司的技术老总，有8位是我们的校友”

几乎是在李华回到杨凌的同一时期，1987年，王辉也开始为日后名扬全国的小麦良种“西农979”做第一次组配。

小麦育种是极为枯燥和寂寞的工作。从亲本产生的第一代“杂种”到基因纯化获得稳定性状，至少需要八代，每代都是一年。

“高产、优质、抗病、强适应性，这些性状分布在不同材料中，选配好亲本把它们聚合在一起，最难！”王辉娓娓道来。育种需不断优中选优，从杂交到最终过审，动辄十余年，一旦看走眼便会前功尽弃。在育种界，终其一生也难以选育出良种的人亦不在少数。

他白天到地头观察长势，晚上回到办公室记录资料，披星戴月，风雨无阻。人手不够，就妻女齐上阵，孩子们的假期基本都是在麦田里度过。经费设备少，他就“私款公用”从工资里抠，把实验室和家都搬到了试验田。

执着终于结出硕果。2005年，“18年磨一剑”的“西农979”相继通过省级和国家级审定，以其高产、抗病、早熟、越冬性强等性状，迅速从关中麦区走向黄淮海大“麦区”。目前年推广面积稳定在1500万亩，累计9000多万亩，**是全国推广面积第四大的冬小麦品种**，也是少有的从小型麦区走出的良种。

留守杨凌的李华，则收获了桃李天下。

多年来，西农大先后培养葡萄和葡萄酒专业硕博士生400余名，本专科生3000多名。葡萄酒飘香处，皆有西农人。

“全国葡萄酒行业80%的技术骨干出自西农大。国内11家葡萄酒上市公司的技术老总，有8位是我们的校友。”房玉林说。

学生眼中的李华，极具家国情怀。他屡次放弃从政和调动机会，始终坚守科教一线。他一心想打造出中国特色的葡萄酒文化和评价体系，为国产葡萄酒争口气。

房玉林说，过去国际观点认为，中国并非酿酒葡萄优生区。李华团队经过多年研究，**用中国特色的气候区划指标体系，将葡萄产区从环渤海拓展到西北、西南多地**。在他团队的推动下，近年来新疆、宁夏、甘肃等地发展酿酒葡萄65万亩，带动农民年增收32.5亿元。

“归纳起来，我这大半辈子，引导了一个产业的发展，培养了一批人，开创了一个学科。就干了葡萄酒这一件事，值了！”一次和友人聚餐时，李华动情说道。**曾经文质彬彬的南方小伙，如今已和地道的关中老农并无二致**。

年长李华十几岁的王辉，更是朴实得毫无书卷气。在西农大如今70多个小麦育种团队中，他对种子的痴迷人尽皆知。

师从王辉20多年的西农大农学院副教授孙道杰说，在杂交、收获和考种的关键时期，王辉在地里时常一蹲就是一天，甚至多次晕倒被送医。为节省时间，他还养成了不吃早饭的习惯。

“小麦就是我的娃！”这是王辉的口头禅。40多年来，无论酷暑严寒，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地里转转，**“不摸摸小麦，就浑身不自在”**。

事实上，在那个艰苦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因坚守在杨凌而结出硕果的，又何止李华和王辉！

著名小麦育种专家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，何梁何利奖获得者、昆虫分类学家周尧，中国“克隆羊之父”张涌…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养福说，在孔雀纷纷东南飞的时候，一大批农业科学家扎根黄土，坚守杨凌，保留了农科城的火种。

昔日的火种，今日已成燎原之势。

1997年7月29日，国务院批准成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，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“农字号”高新区，小城杨凌迎来新生。1999年启动的农科教体制改革，将杨凌的多家高校院所合并重组、优化资源，新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应运而生。

如今的杨凌，虽仍是个仅有24万人口的小城，但已初具城市规模，环境大为改善。西农大也跻身国家“211工程”和“985工程”之列，成为我国农业高等教育在中西部地区的一面旗帜。

心系民生，不像专家像庄稼

> 因在基层难以发表高水平论文，教授当了12年还去不掉一个“副”字

在基层扎久了，那个从机关下来的刘占德也多了几分“泥土气”：

运动衣、牛仔裤，一身朴素打扮，皮肤黝黑，普通话里还夹杂着浓重的方言口音。农民说他，不像专家像庄稼。但其实他挺“洋气”，之所以选择从事猕猴桃的示范推广，也是深思熟虑之举。

2007年，西农大决定在陕西各地的特色农业主产区建立8个永久性试验示范站，集科研、教学、示范和推广于一体。刘占德主动请缨下站。

“领导让我去搞苹果，我想，反正都是从零开始，还不如去干猕猴桃。”刘占德说，他早就做过功课了，这小小猕猴桃看上去不起眼，但长在深山、营养丰富，还很有“国际范儿”，能与国际市场接轨。

刘占德兴冲冲地申请到学校的项目，到新西兰皇家园艺与食品研究院猕猴桃研究中心进修学习。一年多的时间，育种、建园、质量控制、生产管理、储藏保鲜，他一个流程没落下。果园、实验农场、科研单位、工厂，他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。

新西兰同行议论纷纷，“这个中国人过得太苦了，连出游的时间都没有！”

学习过后，刘占德看到差距，更有了信心，“我们暂时落后是因为没重视，可别叫我们认真起来。我们一重视，肯定比你们做得好！”

不承想，学成归来刚到试验站报到，他就迎来“当头一棒”。**因为是半路出家学习猕猴桃，同事不信任、群众皱眉头。风凉话也纷至沓来，“机关的人，肯定是来镀金的，不长久的！”**

接下来的事，令风言风语者刮目相干。刘占德找朋友借钱买了辆小车，有事没事就往山里钻，他想看看陕西的猕猴桃产业，究竟和国外的差距有多大。

半年后，一份详尽的调研报告出炉，直指当地产业之弊：品种混乱、缺乏规程、无序发展，农民自发种植，产销加之间的链条没有打通。他还开出“药方”：突破口就是要有技术规范和标准。另外，中国是猕猴桃原产地，完全可以通过挖掘自有种质资源，在品种上参与竞争。

这份报告一下打开了局面，刘占德就此行动起来。他从学校吸纳一些新鲜血液，研究土壤的、植保的、育种的，组成系统的研究团队。陆续收集了27个品种或变种、2000余份种子材料，建起种质资源圃。研发出一套优质壮苗快速繁育体系，果园从建园到达产的时间缩短两年。

8年过去，刘占德团队培育的脐红、农大金猕等4个新品种，果型漂亮、抗病丰产，累计推广近10万亩，带动了一大批专业大户发家致富。**在示范站带动下，眉县的猕猴桃种植面积从2005年的5万亩增长到如今的30万亩，成为陕西的猕猴桃优质产区**。他本人包扶的眉县金渠镇田家寨村，**村民自发将村里的一条路命名为“西农路”，以表达感激之情**。

尽管家就在40公里外的杨凌，但刘占德仍每年超过200天住在试验站。在这里，他陆续培养出13名硕士研究生，昔日破败的试验站也发展为农业部国家猕猴桃创新基地。

“我到42岁才真正找到人生想要做的事业”。既然选择了猕猴桃，就把一生交给它。看到群众因为猕猴桃脱贫、致富，我特别高兴！”言及此处，这位硬邦的陕北汉子竟潸然泪下。

被他帮助过的群众，都心存感激。几年前，刘占德有次下乡查冻害，车子停在路边。一个猕猴桃专业村的村支书驾车路过碰巧看到，非要拽着他去家里吃饭。这时，另一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也经过此地，一样抢着要请刘占德吃饭。双方争执不下，最后达成协议：一家炒菜，一家出酒。

平时不胜酒力的刘占德，那天一醉方休。

从最初8个试验站起步，**截至目前，西农大已在全国15个省区建立了粮油、果树、蔬菜、畜牧经济林等26个产、学、研“三位一体”农业试验示范站和40个示范基地**。每年有超过300名科教人员常年深入一线，与地方1000多名基层科技人员组成团队，开展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。

和刘占德一样，核桃专家刘朝斌的课堂都在田地里。因接地气，他的课总是特别受欢迎。

“你看，如果三个主枝这样分布，彼此夹角120度，是不是无论太阳在哪里，都能透光通风？”刘朝斌把自己当作一棵核桃树，伸出双臂、比比画画。

这位西农大林学院的副教授，每年要在陕西陇县、宜君、黄龙的核桃试验站驻站超过百天，在“田间课堂”开讲90次以上，每年培训的农民近万人。

“别的教授讲课，画了一黑板，净说咱听不懂的理论。刘教授三言两语我们就明白了。”陇县垅底下镇核桃专业户张金芳说。

语言接地气，研究的也是群众生产中的问题：**他研发的“地膜包扎法”，将核桃嫁接成功率提高到95%以上**，被陕南农民称为“一场核桃革命”；就地取材的“穴贮肥水”技术，用3桶水就能管好核桃树，在关中渭北旱塬推广近5万亩，产量提高50%。

常年在地头，刘朝斌看上去比农民还要朴素几分：不修边幅、皮肤黝黑，发黄的指间夹的是5元一盒的香烟。**也因在基层难以发表高水平论文，教授当了12年还去不掉一个“副”字**。

对此，他一笑置之，“电搞农业的，让农民得实惠就够了！”

在农民眼里，这批推广专家，就代表着西农大和农科城。多年来，西农大的试验示范站先后引进和推广新品种、新技术1350余项，累计推广示范面积超过3亿亩，新增经济效益500多亿元，培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技骨干和职业农民50万人次。试验站甚至有了“国际范儿”，陆续和15个国家210多名专家和国内外60多家科教单位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。

“工作第一”，生生不息

> “刚刚驻站时，群众上山放羊，兜里揣一个黑面馍馍都要分半个给我们。我之所以待得住，也是因为扎得深，和群众有这份感情”

在水土保持专家程积民的记忆中，过去几十年，一向乐观的自己只哭过一次。

1987年，他已经在宁夏固原云雾山保护站驻站工作5年。保护站孤悬山间，距离最近的村、镇都有十里山路之遥，再急的电报打过来，等捎到站里已是几天以后。

那一次，程积民接到妻子3天前发来的电报——“7岁的儿子严重发烧，速回！”

他慌了，一口气跑到镇上，给家里拨电话时，双手都在颤抖。“听到孩子病情好转，我身子一瘫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”

在外人看来，他的工作很苦：每年近200天驻扎在云雾山的半山腰上做研究，一扎根就是30多年。**过去没有通电，夜里看书要戴口罩，否则鼻子会被煤油灯熏黑**；吃饭时经常狂风大作，碗里落了沙子，用水冲个七八分就接着吃；一到下雨，雨水顺着窑洞壁上的鼠洞哗哗往下淌。

更难熬的是无边的寂寞。交通不便的年月，从杨凌到云雾山，路上就要走3天。由于经费紧张，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间，站里仅剩他一人苦苦支撑。

但程积民从不觉得自己苦，在他看来，“工作第一”似乎天经地义。即使如今说起那段流泪的往事，脸上也始终挂着微笑。他更愿意回忆自己亲历的“乐事”，说到兴奋处甚至手舞足蹈——

在保护站的推动下，云雾山植被覆盖率从25%上升到95%，昔日的荒山野岭成为黄土高原上第一个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区。保护站条件改善，盖起了现代化实验楼，如今团队有7名博士，后继有人……

云雾山上，生长着313种草，程积民几乎可以认全。这其中，有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草叫本氏针茅。生态恶化草场萎缩时，唯有它傲然生长，秘诀就在于其根系发达，根扎得极深、极广。

“刚刚驻站时，群众上山放羊，兜里揣一个黑面馍馍都要分半个给我们。我之所以待得住，也是因为扎得深，和群众有这份感情。”程积民说。

乐观积极，以苦为乐，朴实无华，几乎是西农大农业科学家群体的共同特质。

“远看像卖炭的，近看是农科院的。”常年与庄稼和土地为伴，育种专家吉万全对自己的肤色开起玩笑。话虽如此，他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，每当发现一个理想的小麦单株，他会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。

尽管咨询的信息和电话时常应接不暇，但刘朝斌还是坚持微信和手机号向所有农民开放。他的微信通讯录里，超过一半好友是农民，加入的组群多数也是讨论核桃技术的。“咱是学农的，农民需要我，就是我的责任。只要有空，我都会给人家认真回答。”

土地是他们的本色。

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的杨凌，是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《诗经·生民》记载：“诞后稷之穑，有相之道……”相传4000多年前，“农神”后稷教稼于此，开创出光辉灿烂的农耕文化。

斗转星移，千百年来，这片热土从未冷过。在杨凌，胸怀祖国、扎根黄土、心系民生的精、气、神，在一代代农业科学家中薪火相传、生生不息：

受李振声先生的言传身教，吉万全放弃留在加拿大工作的机会，返回杨凌。李先生同期的5名研究生中，唯有他至今仍在杨凌；

因心怀“从小到大上学都是公家出钱，就应该回来报效祖国”的朴素情感，长江学者单卫星举家从澳大利亚回国，为马铃薯晚疫病防治倾尽心血；

小麦专家李立科，身患癌症28载，耄耋之年仍每年超过7个月住在基层农技站推广旱作农业技术；

84岁的何梁何利基金获得者、选育出我国推广面积最大西瓜品种的王鸣，将30万元积蓄捐赠助学，自己却甘守清贫。家具是上世纪70年代的，电视是90年代的，一台锈迹斑斑的老式烤箱，总是把糕点烤煳；

60年间3次考察黄河流域，行程10万里以上，其中步行考察3万多里的水土保持专家唐克丽许下心愿，百年之后，将一半骨灰撒入奉献毕生的黄河……

这个名单，还在不断续写。

西农大的前身，是创建于1934年的“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”。那正是国家和民族风雨飘摇，西北地区连年苦旱、民不聊生的岁月。家国危难之际，一批有识之士极力主张“开发西北”“建设西北”，就此点燃了杨凌作为农科之城的星星之火。

今年迎来20岁生日的杨凌示范区，借助西农大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，已建成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62个，累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393项。包括两名两院院士在内的6000余名各类科技人才工作在杨凌，为探索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尽心尽力。

本报地址：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 邮政编码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11185 广告部电话63071265 广告许可证：京西工商广字第0210号 定价：每份0.80元 每月23.80元 年价285.60元 本报挑错电话：010-63073979、63072070